

◎文学聚焦

文学如何创造新人形象

胡一峰

如果把文学比作浩瀚的天空，典型形象就如灿烂的星座；如果把文学视为连绵的山峦，典型形象就如座座高峰。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艺术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

在每个文学发展阶段，“新人”都是典型形象的重要类型之一，以突出的美学价值留存在一代代读者的记忆中。当代文学只有创造出顺应历史潮流、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具有时代精神特质的新人形象，才能真正发时代之先声、燃前进之灯火，承担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使命。

塑造新人是文学的使命

文学意义上的“新人”是时代精神的人格化。“新人”之“新”不仅包括自然时序的内涵，而且具备以社会发展史为依托的价值判断。“新人”是历史变革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和推动者，也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的担当者和引领者，代表着改变现状的实践力量，有着得风气之先的敏锐心灵，又有敢为天下先的蓬勃朝气，最深刻也最生动地反映出历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精神面貌。正因如此，当我们回望历史，眼前总会浮现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当我们品读文学，总能在新人形象中感受历史的脚步、时代的脉搏。时代和新人是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常用新人形象标记一段岁月或一个群体：合作化运动中的“梁生宝”、改革年代中的“乔厂长”、知识分子“陆文婷”、奋斗青年“孙少平”，都是如此。

积极回应时代课题

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总是充满现实感。创造新人形象的过程，是文学介入时代、反映生活的过程，也是文学对社会进步发挥“实质性功能”的过程。正是通过塑造典型人物，文学以一个个富有时代气息的生动形象，让人们在希冀中感动，在苦难中不屈，迎着光亮勉力前行。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刘心武、路遥、蒋子龙、陈忠实、铁凝，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以自己的方式完美地回答了时代问卷，和他们创造出的典型形象一起为历史所铭记。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波澜壮阔的伟大画卷徐徐展开，传统的社会领域、行业和群体在自我革新中发生深刻嬗变，新的读者群体渐次涌现，酝酿和抒发属于自己的文学趣味和美学诉求。当下中国经过数



《金秋助力扶贫》 王菲绘

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正迎来经济发展动力的历史性更替，促使人们重新感知社会发展节奏，调整生活状态和心态；层出不穷的高新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时空观念和情感世界；人民不断提高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促使文艺追求新求变，受众的分众化审美需求日趋明显。这些正是文学塑造时代新人的土壤。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说：“文学其实是一种精神性保持和流转的功能。”形象是文学的语言。文学创造新人的过程，本质上是时代精神寻找形象载体的过程。这就要求作家既从本质上、总体上把握时代主题和发展趋向，在变动不居的社会现象中描摹普遍性的人类情感；又要洞悉社会肌理，深入了解分众化、工业化、碎片化的生活。不管是扶贫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海外维和官兵，还是网络工程师、天使投资人、网购配送员、职业电竞员，每一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只有关注和刻画具体而生动的“这一个”，新人形象才拥有时代气息和生活质感，才能与读者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当下文学对时代新人的塑造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从作家自身的方面看，有的心态浮躁，失去了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和耐心观察，又缺乏深入扎根生活的勇气和实践，对新生事物感到陌生隔阂，流连在浅薄地反映生活的皮相，醉心于一时的喧哗热闹；有的为了抢占题材，急于求成，故意制造话题，导致人物扁平，缺乏真实感。这些都是亟待改变和扭转的问题。

以新人为时代立传

创造新人形象的过程，是作家艺术灵感与生活积极

的互相激发，也是创作理念与文学技巧的互相融合。如恩格斯所言，典型人物应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本的情节的生活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这些年，文学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长篇小说出现“井喷”现象，网络文学更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佳作频出，涌现出一系列崭新的典型人物。《海边春秋》里的刘书雷、《经山海》里的吴小嵩、《战国红》里的陈放，是改革大潮下乡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事业中涌现的新人；《雾行者》里的“仓管员”群体、《景恒街》里的城市白领，揭开了文学此前不曾深度介入的社会新领域；在一些网络小说中，也不时能看到海归精英、电竞少年等的身影。然而，与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及其文化风貌、精神气质相比，新人形象创造的空间还很大。

真正立得住的典型形象必须经受时间的冲刷和岁月的淘洗，但成功的新人形象，从作家笔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往往就会带给人欣喜和感动。要做到这一点，作家必须树立创造新人形象的历史使命感。如果一个创作者把文学视为“产业”，把作品等同于“产品”，一味迎合市场和消费社会的金钱逻辑，甘于在流水线式的“创作”中做码字工，或者把创作等同于一己悲欢的表达，沉迷于把玩生活的碎片、情感的“秘史”，甚至认为文学越远离时代和生活就越纯粹，就无法为文学的天空增添新的星光。而当一个作家沉溺于生活的内里，以勇气直面生活，以智慧剖析生活，潜心提炼属于自己的“独特生活”，就踏上了创造新人形象的正途。此外，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给作家把握现实中的“新人”带来一定困难，还需要业界和文学组织持续为作家提供机会。

脱离现实的“新人”是虚妄的，就事论事的“新人”则是扁平的。高尔基说，要知道过去的现实、现在的现实和未来的现实。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可能性不是无根据的猜测，它以现实为基础，又包含现实将要前往的方向和路径，因而有时表现为现实生活的未来形态。一切既成事实并非生活的全貌，必须加上可能成为事实的那些，才是生活的总体面貌。文艺应当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生活”。新时代的作家在遵循“采取种种合成一个”的创作规律基础上，还应以文学家的敏锐、社会学家的缜密、史学家的洞察和哲学家的思辨，主动探究生活中丰富的“可能性”，把创新的灵感转化为感人形象，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杂志副主编）

鲜明的文学史观与历史意识

——评刘江凯《转型与深化：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

陈晓明

刘江凯与我的研究领域多有交集，他的新著《转型与深化：20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读来令人印象深刻。这本书的文学史视野十分开阔，其中颇为独到的是表达了一种大胆有趣却又不失新意的文学史观与分期方式：作者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学称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鸦片战争以来一个重要的文学转折期。

此论认为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确立了一个强大的外在“世界性”参照，并开始陷入到民族国家的主权、生产力、文化的“现代性焦虑”之中。而这种整体的“现代性焦虑”在随后或加重或减缓，在激烈的历史震荡中慢慢地趋向缓和，但并未彻底解决。反映到文学史上，则体现为三种焦虑若隐若现、交织叠加，形成不同时代的文学主潮。

这确实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史观。它多层次、多线条、同时又轻重有别地呈现了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复杂性；它从民族国家“现代性焦虑”的角度重新建立了一种可能存在的“整体性”——这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失去整体性的各类说法给出了新的观察角度。

把握了作者以上的文学史观和分期依据，就不难理解全书各章在处理20世纪90年代文学现象、文学创作、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以及文学史与90年代

文学关系的相关论述。比如关于“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文学”的创作现象，虽然处于不同小节，但作者却认为这些创作可能正是中国“现代性焦虑”发生转向与内化的文学表征。再比如对文坛“下海”现象及“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大讨论，都可以视为是生产力和文化焦虑在社会巨大转型中被挤压出来的表征。

本书也是对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种回顾性研究，除了文学史观和分期方面的亮点外，在上世纪90年代报纸期刊中挖掘第一手资料也有可圈点之处，比如对《中流》杂志的发现与讨论。作者对上世纪90年代文学现象的筛选和评论既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也有一定的史识。

除了作者在后记中已经意识到的问题，如缺少90年代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分析；对有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讨论展开程度相对不足外，全书的理论主张和章节内容的呼应性也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在一部90年代的文学断代史中，细密地融入“现代性焦虑”、世界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理念，可能是作者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本书还体现了作者将海外传播视角引入90年代文学研究的有益尝试。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确实需要放在世界中去理解，这显然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诗为史 以史为诗

读彭志强诗集《二十四伎乐》

吉狄马加

彭志强的诗歌创作是一种“以诗为史”、“以史为诗”、相互求证、彼此打开的立体化写作。他的新作《二十四伎乐》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集由一个长诗和两个主题性长篇组诗构成。无论是《将军令》还是《风吹武陵》《二十四伎乐》，都凸显出诗人的历史想象力以及综合写作能力。

这些诗歌无疑都指向了历史时间的深处，带有回溯和叩访的性质，同时又是诗人的个体精神和思想能力深度参与的结果。诗人不仅阅读了大量历史典籍，而且通过两年多的田野考察获得了更为直观的“物证”和真切感受，后者显然更为重要。而这种整体的“现代性焦虑”的诗歌方式需要诗人具备大量的历史知识储备，更为关键的是，诗人要具备深刻的思想能力和对话能力。由此，在历史与当下的精神共振中，诗歌才能发出更为有力和长久的回响。

彭志强的这些诗不只是再现和复活了一段历史，而且在个人情感、智性和想象力的深度参与之后，经过过滤、重构、提升甚至变形，生成了语言化、修辞化和想象化的历史空间。这样的历史碎片和个人意志相互发现的打开方式和诗歌话语方式无疑是综合的、有机的和立体的，体现出光影交织、虚实相间、背景宏阔、意象丰富的特点。这样的诗既有坚实的骨架，又有丰盈的肌理，既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又充盈着诗人个体生命的体温，乃至诗性和哲思的深切观照。

也许，彭志强的雄心正在于做一个史家中的诗人和诗人中的史家。历史具有了诗性更富意味，这既是阅读和考察，也是凝视和对话。

在诗歌体式上，彭志强也有着自觉的追求。长诗《将军令》以及由16首组诗构成的《风吹武陵》都采用双行体的诗歌样式，形式感突出、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在一个愈益碎片化而无限强调个人化写作的语境中，诗人的风格和诗歌的特质反而被消解了，而长诗作为一种整体性写作会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因此，长诗是摆脱碎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从这一点上看，彭志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一切景语皆情语，物象正是心象。彭志强的诗既是历史的，又是诗性的，时空阔大而又直抵当下和世人心。

他诗中有一句话：“风吹豹子脸上的皱纹。”豹子和风，构成了诗人与历史、生命和时间互动的隐喻，是其诗歌追求的象征。彭志强正在自己的诗歌道路上前进着。

（作者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战石油》抒写长庆油田新史诗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我为祖国献石油！”这句四代长庆石油人共同的宣言，如今被演绎成一部壮怀激烈的石油创业史。近日，由诗人高凯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战石油——长庆崛起笔记》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战石油》以新中国石油史为背景，运用诗性笔调抒写了长庆油田50年的创业史，成功讲述了一个石油行业的“中国故事”：2009年，雄踞鄂尔多斯盆地的长庆油田响应中央“创和谐能源，建西部大庆”的号召，开始艰苦卓绝的再次创业；2019年底，长庆油田在建成50周年之际，以连续3年5000万吨的油气年产量，一跃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领跑者。

《战石油》抒写了一个“中国第一”的时代传奇，珍藏了一个英雄部落的青春档案，凝聚了一个乡愁诗人的油田情结，是一部超越行业的非虚构文学读本，也超越了同类题材中浅薄直白的“广告文学”。

作为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高凯自2019年8月，历时4个多月，连续行程5000多公里，深入陕西、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地长庆油田一线，采集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第一手素材。



高凯著
北京出版集团出版

◎编辑荐书

20世纪60年代初，古城仪仗的2000多名热血青年，应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石一凡和他的战友们筑梦长白、风雨京华、鏖战成昆、拼搏襄渝、回鼎青藏，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险恶的自然环境、简陋的装备、贫乏的给养没能动摇他们忠贞报国的宏愿，也未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铁道兵们突破一个个筑路禁区、生命禁区，创造了人类征服荒山恶水的奇迹。

作者以自己20年的亲身经历，真实记述了铁道兵从初创到撤兵的光辉历程，小说塑造了谭铮、杨中华、袁承武等人的英雄形象，倾情讴歌了一代人宽广的爱国情怀，是一部有关铁道兵的波澜壮阔的史诗，是一帧有关人生的跌宕起伏的画卷，是一曲高亢激昂的爱国主义壮歌。



作者近照

徐贵彬

英雄山上

◎创作谈

一直有个愿望，写一部好小说，扣人心弦，发人深省，令人拍案叫绝，催人跃马弯弓——这愿望好的一面旗帜在远处招展，呼唤我在历史的崇山峻岭一路跋涉，一路寻找。思想的背囊里装满了灵感、激情、素材、故事……走一段，觉得差不多了，投宿于某个驿站，摊开稿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思如泉涌，奋笔疾书：《历史的天空》《八月桂花遍地开》《马上天下》《对阵》……一路走来，打造的都是英雄，身后留下一个又一个文字建筑，有的赢得一阵掌声，有的随风飘零。有没有找到最想找到的、有没有写出最想写出来的，只有自己知道——没有，远远没有。

回过头来审视80多年前那场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战场上发生的那些故事，惨烈、悲壮、惊世骇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作家、特别是那些战争的亲历者和目击者，通过文学作品挖掘英雄、书写英雄、呼唤英雄、培育英雄精神，塑造了成千上万个各不相同、血肉丰满的英雄形象。这些作品，引领我走上了战争文学创作的道路。40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在作品中塑造过各类英雄，比如《历史的天空》里的草根英雄梁大牙，《马上天下》里的战术专家陈秋石，《八月桂花遍地开》里的知识分子英雄沈轩轶，《明天战争》里的强军改革英雄岑立昊，等等。随着英雄书写的不断深入，我的惊奇和惊喜也不断增加，因为我发现，在中华民族的英雄谱系里，出现了越来越多新的面孔，他们的精神世界和行为、情感、经历、命运，是我们的想象力很难穷尽的，那将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曾几何时，看到过一个资料，其中有一段内容，抗战前夕国民党派遣特务，潜伏到陕北暗杀中共高级干部，未遂。此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个人这件事一直悬在我脑海里，我常常琢磨他的传奇，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事，一定会很惊险很传奇。我在脑海中展开文学想象：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子，读过什么学校，性格有哪些特点，有没有女朋友，最后是个什么结局……不知不觉中，围绕这个我虚构出的人物，一群新的人物形象在脑海中应运而生——有被那个特务（我把他命名为“易晓岚”）冒名顶替的红军英雄凌云峰，有他曾经的上峰和导师陈达，有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乔东山，有慧眼识珠的红军伯乐刘文戈，有他的搭档和助手蓝旗，还有他在国共两个阵营里的前后女友简紫雨和桑叶……这些人构成了他生存和再生的土壤。最终，是红色信仰、国家意识、英雄理想感染了他、重铸了他，使他从泥潭里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抗日英雄。

从2019年3月开始，我把那些面目已然清晰的人物集合起来，在80年前的月光下列队成山——“英雄山长篇系列”之一《穿插》和之二《伏击》出版，“英雄山”不再缥缈，而成为一座可视、可触的峰峦。

而我本人仍时常沉浸其中，眺望刀光剑影，聆听风嘶马鸣。无数次凝视那片虚拟的战场，那些人和事却越来越真实。生命的雷电穿行于战争之林，唤醒的情感风雨汇聚成命运的河流——常常，我会看见他们中间那几个超凡脱俗的女性，我的心里一直放不下她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英雄山还会出现“之三”？当然，这是后话了。

“英雄山”前两部作品的结构乍看起来很清楚，一个反动阵营里的特务最终回到保家卫国的轨道，而另一个误入国民党军队阵营的红军将领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作为信仰支撑，完成了一个英雄的涅槃，双方相向而行，擦肩而过，最终殊途同归。我把这个结构命名为“目标式结构”，首先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然后是站在典型人物的立场上。当我们洞悉了此类人物的心灵，把握了此类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逻辑，余下的就是跟着他走，走过一条柳暗花明的道路，走向“英雄山”。



《英雄山·穿插》与《英雄山·伏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何建明报告文学《上海表情》出版

本报电（张悦竹）9月6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上海表情》新书首发式在京举行。该书作者、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中国作协散文专委会委员黄宾堂，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与现场读者分享了该书的创作过程和阅读感受。

今年初，何建明因新冠肺炎疫情意外滞留上海，在百余天时间里，他亲身经历了上海抗疫工作从开展到取得成效的过程，并用深情的笔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真实记录下来，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人民至上”的温暖底色。

张亚丽说，这是一部视角独特、体验真实，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的抗疫题材作品。作为一名怀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总是第一时间冲入现场采访。《上海表情》是个人视角下一份珍贵的抗疫记录，饱含了作家的一片赤子之情。